

當前越戰的政治面

陳紹賢

在美國對越戰不求勝只求和的政策下，戰場上的進退得失，對於整個戰局可無決定性的影響。去冬華府多方力求實現和談，無論見於它的使節在各國從事活動，或透過第三者向河內作間接試探，或直接在他國境內與北越人員接觸，這些政治活動較之它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似是比重有增無減。它會接受友邦的意見——停止轟炸，可能促使北越同意和談——停止此項重要軍事行動，達卅七天。在那期間，它的求和努力格外加強。這尤為政治行動重於軍事行動的明證。當時強烈的和平攻勢，也有對內的政治作用，那就是為和緩姑息主義者的反戰運動。

恢復轟炸的那天——一月卅一日，詹森總統向全國廣播宣告：「停炸的終結，并非意謂我們自己追求和平之終結。」他同時打開追求和平的新途徑，正式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越戰和談的議案。

壹 聯合國未能處理越案

美國籲請聯合國謀求和平解決越戰，早起於去年七月廿八日詹森總統致宇譚祕書長的函件及高德柏大使於七月卅日和今年一月四日先後分別致安理會主席與宇譚的書信。不過美國過去的這些籲請，都不是正式要求安理會開會討論。直至一月卅一日她向安理會採取的行動，才是一種正式的提議。

安理會於次日開會辯論美國的提案是否列入議程，因約旦代表尙待其政府的指令，延至二日再開會舉行表決。結果中、英、美、阿根廷、日本、約旦、荷蘭、紐西蘭和烏拉圭九票贊成，蘇俄和保加利亞兩票反對，法國、馬利、奈及利亞及烏干達四票棄權。這是一個程序案，蘇俄的反對不構成否決，所以是通過了。

當前越戰的政治面

安理會次一步驟為討論美案的內容。它的要項有二：一是要求不附任何先決條件，立即由各適當有關的政府，安排一項會議，以期達成實施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內瓦協定，及建立東南亞的持久和平；二是建議上項會議的第一任務，在越南安排一項有效監督的停止敵對行動。

迄今月餘，安理會尚未集會討論本案，二月份它的輪值主席日本代表松井明會在會外尋求各理事國對美案能獲致一種一致的意見，但終失敗，致會議未克重開。此中主因為蘇俄的蓄意破壞。費多林柯（Nikolai T. Fedorenko）在二日安理會席上已說過：美國的提案「只是一種轉變的策略，用以遮蓋五角大廈為擴大侵略戰爭的步驟。」所以「蘇俄代表團反對安理會討論越南問題。」（註一）莫斯科這種決策不無受了北越和匪共的影響。北越「外交部」曾聲稱：「聯合國無權討論越南問題；它對此問題的任何決議無效。」北平偽組織宣稱，他們充分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反對聯合國討論越南事件的聲明。（註二）

安理會未能處理美案的實質問題，當為華府始料所及。在詹森決定提案前幾天——一月廿五日，高德柏在華盛頓對七十位民主黨議員說明，美國向聯合國覓求越戰停火的時機尙未成熟。數天之後，華府在時機仍未成熟的情況下，為什麼突然提案呢？這可能為幾種政治因素所促成。

向安理會提案與對北越恢復空襲，乃美國總統同時宣佈的兩件大事。前者為政治行動，後者為軍事行動。同時，前者不是為後者支援，而是給後者涵蓋。因為對外來說，停炸的終止，必然引起國際姑息主義的抬頭，而附和共黨對美安肆攻擊。華府不能只憑美軍安全需要的理由，去抵擋國際間不顧正義的譴責，所以它向安理會提案，可表明其求和的誠意與決心，并藉以爭

取世界輿論的同情。

對內而言，恢復轟炸可能助長姑息派的反戰活動。當時民主黨部份議員極力要求總統向聯合國採取行動。他決定作此提案，也為表示接受他們的意見，以利促進黨內的團結，減少國會中對政府援越政策的阻力。

對敵而言，在各種求和的努力都被拒絕之後，華府提請安理會促成和談。這表明它的和平攻勢再接再厲，愈挫愈堅。但其必然仍受敵方的攔拒，遭俄、法的破壞或阻撓，當也在華府預料之中。尤其是它明知蘇俄的否決威脅，使安理會無成立決議的希望，而不郵後果，仍以聯合國為尋求和談的中心，這無非此舉有利於對敵政治作戰，可使舉世了然越戰之不能和，責任在於北越，尤其在北越侵略的操縱者——匪共。

貳 日內瓦會議在憧憬中

華府的安理會提案中建議舉行「一項會議」，商談實施過去的兩次日內瓦協定。這是在提案文件上有意避用「日內瓦會議」之名，實際上却是企求由安理會促成新的日內瓦會議。當這提案被通過列入議程之日，高德柏在記者會上已有這樣的說：「美國對本案表決的結果感到欣慰。這表示實際上大家都同意應召開一次日內瓦會議。……我們預備前往參加。」

對此問題，松井明為獲致「一種一致意見」的努力失敗後，他發出一項報告書，指出在各理事國代表中有「某種範圍」的共同意見：一、認為在越南繼續的敵對行動，殊可憂慮；二、認為應尋求談判，以適當方式及依日內瓦協定的方向，結束此一戰爭。

認識應依日內瓦協定去尋求越戰的解決，這是一個問題。但如何實現一項會議，以便基於此種認識，去達成關於實施日內瓦協定的協議，這是另一問題。前一問題，北越和匪共都會作肯定的表示。北越的這種表示，且會得到俄、法的支持。最近的事實是：費多林柯在二月二日安理會席上說：「蘇俄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的正當立場——越南問題必須在日內瓦協定的範圍內解決。」二月十五日，巴黎發表戴高樂致胡志明的復函中有說「你（指胡）也表明願望我的國家對於日內瓦的越南協定，負起充分的責任，促成衝突的解決。你知道，法國在她的份內，對於一九五四年七月廿日的協定切實

實施，從沒有點欠缺。……我要告訴你，法國對此的關切，已是在從事工作，俾便加速此衝突之終結，并儘可能早予參加它的解決。」（註三）

當前困難的問題是此一會議如何召開，尤其是是否讓越共的政治組織——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參加？在華府的和談問題十四點意見中的第十三點，對此的態度不够明朗。二月十一日，高德柏從華盛頓回抵任所後公開地說：「無論西貢或華府都不能承認越共為越南的代表。」此與河內一向堅持的「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必須被視為越南的唯一代表」，恰相背馳。新日內瓦會議尚在憧憬之中，其主因在此。它將能否舉行，其關鍵在於蘇俄和法國。

蘇俄和英國是日內瓦會議的共同主席。去年為商談越南問題或柬埔寨問題，英、美、法都願望該會議重開。英國會迭次商請蘇俄共同召集，都被婉拒了。當時蘇俄之所以出此，為的在避免受匪共的攻擊——所謂「修正主義者與美帝勾結，出賣越南民主共和國。」最近英首相韋爾遜訪問莫斯科，也會與俄僑們談到日內瓦會議問題，但無結果。此次蘇俄未同意該會議的召開，可能另有原因。他們對美國內部的反戰行情看高，又鑒於華府求和迫切所暴露的弱點，遂認為越戰的延續，足以削弱美國的國力，降低美國的聲望，自不願助成會談，而為強敵解脫嚴重的困擾。

法國還是願見日內瓦會議重開的。遠從前年秋起，戴高樂一直想調解越局，以重建他在東南半島的聲望。華府對於他的這種野心，會有戒備。因之他就暫持靜觀的態度。最近美、俄的越局關係有了僵化，華府有所求於巴黎了。高德柏飛訪戴氏，親遞詹森的信件，其目的就在於此。不久（二月二日），國務院發言人公開地說，華府希望法國能對促成日內瓦會議有所行動。

最近的情勢又演變了。戴氏將於六月作莫斯科之行。當此行前，他在進行破壞北約組織的工作。他已正式通知十四個盟國說，法國軍隊將退出北約組織的軍事體系，并要求各國的軍隊（主要的是美軍及其基地）撤離法國的領土。這也是他反美親俄的一種舉措。

戴氏且已發表他致胡志明的書信，不啻公開指稱美國破壞日內瓦協定，而為蘇俄頭子的反美宣傳作幫腔。不僅此也，二月十七日，巴黎一家下午報（Le Monde）透露二月九日戴氏致詹森復函的要點：一、指出美國在越南將無軍事勝利希望；二、恢復轟炸為不當的行為；三、只有越南人民才能解

決他們自己的問題。如果這報導屬實，那末，假使戴氏訪俄的結果，將有日內瓦會議的實現，則該會議能否符合美國的期望——依據一九五四和六二年的協定，和平結束越戰，并建立東南亞的持久和平，實在大有問題。

叁 檀島會談的背景與重心

華府於兩月餘的強烈和平攻勢失敗之後，繼以安理會的提案受制於蘇俄，不能達成安排會談的協議，因之國內姑息主義者的氣焰囂張，承認越共為談判對象的呼聲益高。這種情況，對於越南的士氣民心有極不利的影響，於是越南政府更加提高警覺，向華府堅決表明，一切的和談安排，都須先徵求他們的同意。這是檀島會談的一點背景。

美國在越一面從事有限戰爭，一面努力追求和談。因此被稱為「雙軌政策」。實際上這雙軌是不平衡的。因為她會急求和談，竟作長期停炸，聽任敵人的實力長大起來，這是一種不平衡。而且她只要和談，不惜屢次降低和談的境界。（註四）對於本身的軍事行動，則限制甚嚴，這又是不平衡。凡此情況不但為越南政府所反對，而且為在越美軍所不愜。這些情緒之必須疏解，也為檀島會談的背景。

時至去年年底，求和的希望已是渺茫，詹森總統在元月的「國情咨文」中預言：「我們也許必須面對一個長期而艱苦的戰鬥，或一個長期而艱苦的會議，或甚至兩者同時俱來的局面。」因此，他不能不對越南反侵略力量作積極培養的打算。他又鑒於八個月來的阮文紹阮高奇政府已能安定。（最近阮正詩事件的演變，望不至更惡化。三月十七日魯斯克在衆院外委會席上表示，他認為該事件不至嚴重威脅阮高奇政府。）阮總理的忠貞苦幹，坦白虛心，也已引起美方的重視。當魯斯克和哈里曼訪西貢時，親聆他在全國軍人代表大會作政治報告，對和戰問題，表明獨立的嚴正立場；對今後設施，強調必須在作戰期間，改善人民的生活，矯正社會的不平，消除政治的缺陷。不然的話，他斷言：「我們就無法把侵略者驅逐出去！」據說這些話給詹、哈二氏以深刻的印象。他倆建議總統幫助他成為越南的領導中心。因之美國先以平等互尊之禮相待，而有詹森檀島之行。這又是檀島會談的另一背景。

二月六日至八日的檀島會談，先後發表三種文件：一、詹森總統在機場

當前越戰的政治面

的歡迎詞；二、美、越的「檀島宣言」；三、美、越「聯合公報」。這三者可幫助我們了解會談的重心何在。

詹森的歡迎詞中指出兩國政府領袖到檀島會談，為的是「商討我們捍衛和平及為越南人民建立一個康樂社會的決心。我們是來此特別商討和平的工作。因此，我們離去時將不僅決心贏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也將決心贏取反飢餓、反疾病及免於失望之戰的勝利。」

美、越「檀島宣言」的「第一部份」聲明兩國決心防止侵略，致力於實現全體越南人民的希望，並承諾謀求正義及穩定的和平。「第二部分」為兩國政府分別聲明他們的目的。

越南政府的目的，在從事四方面的鬥爭，去達成：①擊敗越共和那些與他們在越南領土內非法作戰的份子；②消除不公正的社會現象，促成真正的社會革命，建設新的社會，使每個人有前途，有尊嚴，受敬重，有表達才智與希望的機會，他及其子女得生活在無失望的環境中。③建立及維持穩定的及有維生能力的經濟，以改善人民生活。推行節約政策，盡善利用外來的援助，協助人民達到正常的經濟成長及更佳物質福利。④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保證制定憲法；依法選舉，建立民選政府。

美國政府的目的：①聯合越南政府與人民一同從事遏止侵略；②支持越南政府對自由選舉的目的及社會改革的措施；③支持越南人民一面戰鬥，一面建設的工作。並將繼續協助他們穩定經濟，增加農業生產，普及教育，撲滅疾病；④在越南政府諒解及支持下，美、越政府的和平攻勢，將繼續至和平獲得之時為止。

美、越「聯合公報」全文可歸納為幾點：一、兩國政府領袖同意繼續從事尋求和平的外交努力；二、兩國政府將採取進一步的具體措施，以對抗越南的通貨膨脹；三、美國政府對越南提出的高度優先地區從事特別積極努力的計劃，保證提供充分及迅速的支持；四、關於農村民主制度、農業建設計劃及農村工作保護，兩國政府同意其快速進步極為重要；五、同意將農業技術智識自實驗站推廣到田地裏的農民；六、同意加強衛生和教育的計劃；七、美國保證支持越南政府提出的難民問題計劃；八、兩國對加強軍事效力，及對越軍與美軍間更密切合作的政策，達成完全協議。

綜觀這些文件的主要內容，可知檀島會談的重心在於政治——廣義的政

治包括經濟、金融、社會、教育及衛生等事項。這些事項連同建立民主政治、制定憲法及自由選舉等事項，共佔會談項目十之八、九，儘管軍事的決定是不會發表的。

注重政治的反侵略戰爭，才能保證最後的勝利。共黨的侵略戰爭號稱「人民戰爭」。要擊潰他們，只有用政治戰作軍事戰的前鋒與後衛，才能奏效——從根本上瓦解共黨所驅策的人民，並轉變其為反共作戰的主力。泰勒將軍在任駐越大使期間，曾有注重越南的經濟社會改造，以加強政治作戰，確保軍事勝利的計劃。惜當時越南政變頻繁，無法着手。今後越南政局如能安定，檀島方案見諸實施，則真正和平的達成，才有把握。

肆 美國內部的爭論

對援越問題，美國國內原有強硬派與姑息派的爭執。詹森的政策是走折衝兩派的中間路線。換言之，他要從事有限度的局部作戰，同時極力謀求和談。自去冬強烈的和平攻勢失敗之後，繼以恢復對北越空中攻擊，姑息派害怕越戰擴大，大陸匪幫介入，觸發美、匪戰爭，所以他們的反戰運動又復熱烈起來。

美國國會少數反對越戰的議員便乘機促成以越戰為題的大辯論。參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透過電視，向全國報導。因之它的辯論更受到民間普遍的注意。且在聽證期間及其前後，國會議員及政府當局也有在會外發表意見，以支持各自的立場。當今雙方爭論的焦點，涉及如下的幾個問題。

先提關於美國援越戰爭的法律根據問題。

毛斯參議員 (Sen. Wayne Morse) 曾一再說過，美國的援越作戰，沒有條約義務的根據，而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所以他要進行聯同其他議員向國會提出議案，禁止總統徵兵派赴越南作戰；也要對一九六四年八月國會授權總統採取一切辦法，保證美國在越的武力，以抵抗共產侵略的決議案，提出修正案，以防止該項權力之被濫用。

參院外委會主席傅爾布萊特 (Sen. J. William Fulbright) 對此法律根據問題有所挑剔。他於二月二日的電視訪問中說：對於政府屢次聲明的美國對越南的承諾，「我覺得很難找到有透過條約的任何法律的承諾。有一種解釋，以為東南亞公約是這種承諾的源頭，這使我十分冷淡。關於那些辯論

的正確性，我很懷疑。……那是一種自我產生的承諾。」(It is a kind of self-generating Commitment)。(註五)

此次魯斯克在參院外委會作證時，曾解釋美國援越作戰的各種根據。其中屬於法理根據的有兩種：一是依東南亞公約及議定書，越南為該公約的保護地區之一，美國對她負有承諾的義務；一是自艾森豪總統以來，三任總統對越南政府的請求援助，都有承諾。援越作戰與過去援希、援韓反抗共產侵略，同為實踐對他們要求所作的承諾。

其次是關於越共參加和談問題

美國的姑息派主張承認「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為和談對象之一。持此主張的理論較為奇特的，要算是傅爾布萊特了。他把越南的戰亂比之美國的獨立革命，並認為越共勢力的形成與發展，乃由於它所追求的是國家主權的獨立及社會經濟的改進，都是符合越南人民的願望。如果越南人民選擇共產主義的道路，美國只可予以尊重。傅氏基於他自己的這種見解，所以最近屢次強調美國應承認該陣線的政治地位，同意它以獨立政團的資格，參加越戰的和談。

突威甘迺迪參議員 (Sen. Edward Kennedy) 也曾發表一項突出的意見，較傅氏等讓越共參加和談的主張，走進一步。他於三月七日的電視訪問中，主張美國應與越共「直接談判」，以致力於終止衝突。(註六)

魯斯克的作證，會根據國務院去年二月發表的越南問題白皮书中列舉的證據，指證「越南民族解放陣線」乃北越共黨代表大會的附屬組織；它的政綱和政策都是北越共黨所制定的；它的部隊——越共的裝備，大都由北越供給。所以它是北越的南侵工具。美國可反對將來北越的和平代表團裏有它的代表參加，但不能承認它有獨立的政治地位。

再次是越南「聯合政府」問題

羅伯甘迺迪參議員 (Sen. Robert Kennedy) 主張讓越共參加越南的「聯合政府」，以期打開和談之門。他的這種意見，詳見於其二月十九日的書面聲明。過後又有幾次申明或解釋。綜合他前後發表的，可得如下的要點：一、在和談中，該陣線得獨立身份參加；二、美國須給它表明她對和談是真诚的，不是要它來投降的；三、和談中要商定自由選舉前西貢成立過渡政府，其中有該陣線參加；四、在自由選舉成立的新政府中，該陣線的地位由

選民決定。(註七)

甘氏這種主張投合美國「自由份子」的一般心理，所以美國民主行動委員會(ADA)和加州民主黨協會(CDC)等組織都給他熱烈的喝采。

國會兩院議員對甘氏此議持反對的很多，可舉兩位的話為例。艾琴參議員(Sen. George Aiken)說：「甘迺迪參議員的這種建議是相當的紊亂了。分担越南政府任務問題，如果要向越共出價還價，這是西貢的事，不是華府的事。」眾議員賴爾德(Rep. Malvin Laird)說：「除非美國準備在和談上反對一種過渡的聯合政府，越南將踏東歐各附庸國和寮國的覆轍。假若總統接受一種包容共產代表的聯合政府，像他的民主黨好多議員所接受的，則在越南的全部作戰——所有的犧牲，流血，便是毫無意義，也就不應延長下去了！」(註八)

政府要員反對最力者為韓福瑞副總統。當時他在紐西蘭旅次答記者說：越南聯合政府之說，好像要放一狐狸進雞籠裏，也像要邀一放火者進消防隊。那種建議是含有重量砒素的藥劑。後來(二月廿七日)他在華盛頓電視答問中說明為什麼不應強制越南人民去接受他們的死敵——慘殺人民、焚燬人家、毀滅鄉村、暗殺村長的越共去參加聯合政府。(註九)

最後是個利害與道義衝突的問題——美國這樣的援越作戰是值得的嗎？今年一月底，「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發表它向全體國會議員調查他們個別對美國援越作戰的意見。共提出九個問題。第一問題是：「援救越南免被共黨接管，這對於美國是必需的嗎？」答「是」的，眾議員二零六人，參議員二八人；答「否」的，眾議員二十人，參議員六人。該週刊並說明在答「否」者中的理由，有認為「越南對於美國國防，沒有什麼戰略上的重要性。」(註十)

此次參院外委會舉行聽證會，肯南(George Kennan)也應邀作證。他說：

「假如我們沒有像今日這樣地捲入越戰，我可知道，沒有理由表明我們為何必需這樣。越南不是一個軍事與工業的重要地區，以為世界局勢的任何決定性發展，將會決定於該領土(指越南)發生的事件，這是難以置信的。即使越南已是在越共的完全控制情況下，……也不至顯現危險之大，足以解釋我們的直接軍事干涉為正當的。」(註十一)

當前越戰的政治面

他的結論認為凡地區、文化及人民的經驗與美國距離遙遠的國家，美國不應作此種承諾。他的這一證詞，純出於利害的偏見，一反其過去首倡對付共產侵略，美國應採取圍堵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時的立場。

肯南的證詞發表後，韓福瑞在電視答問中有一段話，似是對彼而發的。他說：

「我們在越南協助擊敗或阻止這侵略的武力，不僅是為了越南，而且因為它(侵略武力)是能傳染到整個亞洲和世界的一種毒素，除非它是被遏止了。所以今日我們在越南的努力，有其更大的意義。讓我說，其意義遠較之只為一塊地形而奮鬥的意義，深厚得好多了，縱使那塊地形是重要的。」(註十二)

過了幾天，詹森發表一篇演說詞，釋明美國援越政策十個問題。對其中「值得嗎？」一個問題，他說：

「我想你們知道它的答案。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美國的力量在各地承担防阻侵略，這就是它的答案。我們所信守的，超過了對越南一種特殊條約的承諾。我們信守自由的信念。」(註十三)

這最後兩句表現他較為重視道義的立場。由上述的幾項爭論，具見美國執政黨內部歧見之所在。本來對政策發生歧見，因而有所爭辯，這是民主政治的常態。不過今日華府援越政策在其國內引起的爭論，尤其是少數民主黨參議員的怪誕主張，不但已造成一種形勢，背離了它在緊急時期實行兩黨外交政策的良規，而且有因別具政治作用，竟以越戰會導致美匪戰爭的連鎖邏輯，作詭辯的宣傳，期能鼓動人民的怕戰心理，造成更廣大的反戰運動，迫使政府犧牲立場，不計代價，與敵方達成妥協。這種行動，無異為垂危的共匪打下強心劑。好在美國大多數人民仍然支持政府的援越政策，姑息派的企圖是不會得逞的。

五五年三月廿五日完稿

註一 New York Times, Internat'l Ed. Feb. 2, 1966

註二 早在去年九月二日周匪恩來在北平的北越使館中宣稱：他們「

堅決支持北越的立場，決不許聯合國插手越南問題。」

註三 Text of Do Gaulle's Response to Ho Chi-Minh, Paris, Feb. 15, 1966, AP

• 下轉第十九頁。

ISSUES & STUDIES

(English Edition)

Vol. II No. 6
March 1966

CONTENTS

- Viet Cong's Strategy and TacticsBy *Liu Chi-chun*
 The problem of Revolutioniz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unty Party CommissarBy *Ting Chu-yuan*
 A Study of the Food and Cotttn Production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1965By *Lin Tseng*
 The CCP Sixth Congress and Party Schisms
 (Part I)By *Warren Kuo*

去年春曾在莫斯科發表一篇談話，這篇談話雖然在蘇俄國內遭到扣留未予發表，但在七月份經英國的「新政治家」雜誌發表出來。據亞岡比揚院士說，過去六年內，蘇俄經濟的成長率已下降三分之二，農業方面的成長率大約下降十分之九，從每一年的百分之八，跌至百分之〇·八。在同一時期內，零售商品的成長率竟下降百分之七五，而全國人民的實際收入更尖銳的下降，目前蘇俄人民每人平均實際所得，每月大約為四〇至四五盧布。

以上可以說都是促成七年計劃失敗的重大因素和布柯新政權所採取的預防經濟危機加深的一些預防措施。不過，從中央統計局發表的一九六五年執行計劃結果公佈看來，比以上這些預防措施更具積極意義的，是下面的幾項特點：

蘇俄一九六五年國民經濟成就的特點之一，是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比消費資料的發展速度祇高了一·五%，這是自蘇俄工業化以來最小的一個距差；

去年的農業投資達到一一〇億盧布，這不但在統計上顯示是最近幾年最大的一個數字，同時如果將通貨緊縮的因素計算在內的話，則這個數字確可代表蘇俄黨政當局力圖挽救農業落後的決心；

在一九六五年計劃執

行結果的公報上，提出關於生活服務的統計報告，即工業性的工作量比去年增加二一%，非工作性的工作量增加二二%，這是打破以往紀錄的一項特點，它起碼對人民生活作出一種關切的姿態；

最後，就是一九六五年平均工資的增長比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快，而實際收入的增長比國民收入快。

假如說上述一九六五年所表現的這幾項特點，今後能繼續下去的話，蘇俄新的五年計劃或可免蹈七年計劃失敗的覆轍，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以發展重工業為優先和把握國民經濟中比例關係的教條，今後已不復存在。

註一 一九六一年改為五二〇億盧，又於一九六三年改為五〇八億盧。
 註二 一九六三年會改為九五〇千噸。註三 一九六五年生產一、四八五部。
 註四 一九六五年生產六四一部。

上接第13頁

- 註四 參看拙作「越戰和談問題」刊「問題與研究」五十四年十一月號
 註五 Washington, Feb. 2, 1966, UPI
 註六 Edward Kennedy on NBC-TV Program, Washington, Mar. 7, 1966, AP
 註七 Robert Kennedy's Statement and Explanation, Vid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 7, 14, 1966
 註八 Text of Statement in Congress By Rep. Melvin R. Laird, Mar. 1, 1966,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 14, 1966
 註九 Humphrey Presents Another Side of Vietnam Debate, Feb. 27, 1966,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 14, 1966
 註十 The Congress Sizes up The War,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 31, 1966
 註十一 Time, Feb. 18, 1966, P. 12
 註十二 同註九
 註十三 Johnson's Restatement of U.S. Aims(Excerpts), Time, March 4, 1966, P. 10